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2004/WG.18/2
17 February 200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发展权问题工作组

2004年2月11日至20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4(b)

审查在促进、执行、实施和享受发展权方面的进展与障碍

审议发展权问题独立专家的第六份报告

在目前全球化背景下执行发展权 *

* 本报告迟交是为了列入最新资料，包括2003年12月访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成果。

内容提要

发展权问题独立专家的这份报告是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2003/83 号决议提交的，该决议请他深化关于国际经济和金融问题对享受发展权影响的初步研究。撰写本报告期间，他访问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

独立专家扼要介绍了现阶段全球化的主要特点，论述了对预期发展结果和实现发展权方法的影响。他还分析了技术创造者向技术接受者转让技术的问题以及技术转让对实现发展权的影响。

分析指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并不总是促进经济增长，即使促进经济增长，也不总是增加公平和社会正义或减少贫困。虽然全球现有发展改善了实现发展权的整体前景，将生产和消费的疆界扩展到国家边境之外，但发展权的享受不一定在国家间和国家内、地区间或人口阶层间统一得到改进。所以，需要调整和指导市场，使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实现发展权的预期结果相符合。报告承认，将各种潜力转化为实际能力的首要责任在于国家。国家需要采取适当政策，掌握全球经济提供的机会。它还需要一个发展政策框架，得以逐步、可持续地实现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独立专家指出，在执行发展政策和管理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发展合作有着明确、重要的作用。包括国家和国际机构在内的国际社会有责任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环境。事实上，国际社会成员接受和承诺遵守这些法律文书时，就有义务切实支持这些国家努力通过贸易、投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实现所有人权，包括发展权。

独立专家概述说明了有助于管理全球化进程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国家和国际步骤，以便实现人权，包括发展权。为此，他重新审视了“发展契约”的概念，将其当作在国家一级实现发展权的一种可能手段。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1 - 2	4
一、发展权——概述.....	3 - 6	4
二、全球化与发展权.....	7 - 30	6
A. 增长——绩效与前景.....	10 - 11	7
B. 贫困范围与分配不平等.....	12 - 18	8
C. 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	19 - 22	10
D. 资金流动与金融不稳定.....	23 - 25	13
E. 全球化及其对决策的影响.....	26 - 30	14
三、管理全球化进程：致力于执行发展权.....	31 - 38	16
A. 执行发展权的国家政策.....	33	17
B. 执行发展权的国际合作.....	34 - 35	17
C. 发展契约——在国家一级执行发展权.....	36 - 38	18

导 言

1. 发展权问题独立专家的第六份报告¹ 是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2003/83 号决议提交的，该决议请独立专家与所有有关联合国机构和布雷顿森林机构协商，深化关于国际经济和金融问题对享受发展权影响的初步研究。决议特别要求他分析评估和评价此种影响的现有努力和方法，还要求他侧重于技术转让对实现发展权的问题和影响。为深入探讨他在初步研究(E/CN.4/2003/WG.18/2)中提出的内容，他于 2003 年 12 月 8 日至 12 日访问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与这些机构进行了广泛磋商，以完成报告定稿。

2. 独立专家在本报告第一部分重述他在相继提交发展权问题工作组和人权委员会报告中提出的发展权概念。在第二部分叙述本阶段全球化的主要特点，讨论其对预期发展结果和实现方法的影响。他还分析了技术创造者和技术接受者——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之间为实现发展权而转让技术的问题。第三部分讨论“管理全球化进程”问题。在现有证据和几项案例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如果各国打算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机会需要在国家和国际各级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在本部分结尾，独立专家论述在目前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国际合作执行国别发展权的方案，并重新审视他在以前报告中提出的“发展契约”概念。

一、发展权：概述

3. 独立专家按照《发展权宣言》第一条和序言，将发展权界定为“可以充分实现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特别发展进程的权利。² 发展被视为一个经济增长进程，一个国家的产出和就业随之扩大，体制转变，技术进步，人民的福祉稳步改善。当此种福祉被看作是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进而增强人民充分实现自己潜力的能力时，导致此种福祉改善的发展进程则可称为人权。实现发展权还被认为是满足人民主要是对国家而且也是对整个社会包括国际社会提出的对一个过程的一系列诉求，这一进程可以使他们整体实现《国际人权宪章》³ 载述的权利和自由。发展权包括人民享受发展进程结果的权利，即进一步实现各种人权；同时也包括享受这一进程的权利。接受诉求的义务承担者必须采取和执行各种符合人权规范、标准和原则的政策和干预措施，促进和确保发展权。换言之，此种发展进程的目的和手段都被看

作是一种权利。此外，还必须将其看作是一种复合权利，即所有权利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公民和政治权利因其相互依存和不可分割而在其中同时实现。这些权利的总体性意味着，如果任何一种权利受到侵犯，复合发展权也受到侵犯。独立专家以改进人权的“载体”来描述实现发展权，也就是说改善某些或至少一种权利，而不侵犯任何其他权利。发展权不是终极事件，而是一个逐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些预期结果甚至全部结果得以逐步实现，制约其实现的资源障碍通过符合人权规范和原则的经济增长而逐步缓解。

4. 实际上，实现所有这些相互依存的权利取决于可利用的资源和人民得到享受这些权利所必需的商品和服务(资源)。有些公民和政治权利可由国家保障，无论其所具有的手段。一国可利用的资源取决于它的自然禀赋以及能否逐步扩大和维持将其转化为有关商品和服务的过程。同样，人们获得有关商品和服务也取决于他们的自然禀赋(物质和人的禀赋)，如果予以机会，能否提高这些禀赋。假定一国资源不增加，若不减少另一种的供给，实现人权所必要的任何一种有关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都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同样，获得有关商品和服务还取决于公共政策，特别是公共支出。公共收入不增加，公共支出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反过来，也与一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有关。

5. 因未能就所称人权和发展权指数达成共识，独立专家着重采用各种惯常使用的社会经济指数来监测和评估实现发展权的发展进程。个人和人口阶层成员在教育、卫生、饮食或住处以及公民和政治生活方面(与国际人权标准相吻合)达到的水平，可被解释为实现包括复合发展权在内的各项权利。实现按顺序选择的复合权组成内容取决于一国的国情和优先事项。独立专家说，对实现发展权进程的特点和这些努力的成功或失败进行适当分析时，应着眼于消除贫困——最恶劣形式的剥夺人权——的政策以及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不受发展扰乱影响的政策。贫困是多层面的，从收入性贫困到包括营养、卫生、教育、社会保障在内的能力性贫困，使贫困切实成为对发展权的剥夺。对贫困和弱势群体的福祉，应以其收入、消费和反映在获得食物、教育、卫生、住处和工作的能力来测算。因此，消除贫困政策正是实现发展权政策的实例。

6. 独立专家在初步研究(E/CN.4/2003/WG.18/2)中指出，发展权指数是实现各种权利所需商品和服务供给指数以及依权利(公正、非歧视、参与、问责和透明)享

用这些商品和服务的有关指数的综合。有关享用指数可能很难拟订，而供给指数则可从惯常使用的社会经济指数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所列指数中衍生出来。独立专家在最近访问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的报告(E/CN.4//2004/WG.18/3)中评估了这些国家执行发展权的经验，即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维持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减少收入和财富的高度不平等。经济增长对促进实现相互依存和不可分割的各种人权⁴包括发展权起着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后两种关切是基于权利实现人权办法的核心。⁵ 遵循这一办法，本报告下一部分审查现阶段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发展对执行和享受发展权的影响。

二、全球化与发展权

7. 全球化是一个世界不同地区国家经济因商品和服务市场、需求与供应、投资与储蓄、资金流动和资本持有、机构之间以及信息、技术和知识更加相互依存而形成一体化的过程。对国家而言，是市场力量通过国际贸易、跨境资本流动、技术转让和劳工迁移在国家边境之外进行扩张和运作。还涉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更大政治互动甚至相互依存，特别是在国防和安全方面。对个人而言，全球化进程意味着个人更有可能为其他国家的国民生产商品和服务，反过来消费其他国家的商品和服务。他们可能更了解其他国家的新闻，更受世界其他地区事态发展——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事态发展——的影响。

8. 具体而言，全球化的目前用法是指加快的市场一体化进程。现阶段全球化的特点是(不限于)：技术特别是信息、通信和运输技术巨大进步；资本跨越国家边境迅速流动，资金流动总额成倍增长；跨国公司的规模和力量增加；最重要的是国际贸易相当自由。一个惹人注意的事实是国际贸易自由化在很大程度上由各种前所未有的国际贸易机制进行管理，这些贸易机制成功地将不同国家纳入各项多边协定框架。汇率制度从钉住制度过渡到可调整的钉住制度，最后又转变为灵活汇率制度，推动了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些发展得益于交易成本的大幅度下降，反过来又不断侵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壁垒。于是，1980年以来占低收入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一定比例的贸易流动总额——出口和进口总额——显著增长，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一定比例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数额也急剧攀升。各国绩效与自己过去纪录已有相当的不同，这一期间这些指数都有明显增长。⁶

9. 在分析全球化对执行和享受发展权的影响时，本报告进一步审查初步研究(E/CN.4/2003/WG.18/2)提出的证据，着重注意以下问题：

- (a) 这些国家是否因更加融入全球经济而改进了经济绩效和前景？
- (b) 贫困范围以及人际间和地区间的分配不平等趋势是否朝着预期方向改善？
- (c) 全球化进程是否缩小了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迄今形成的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则和机制是否有助于技术转让，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和减少贫困？
- (d) 在各经济体面临着不可预见的经济和社会失调及危机的进程中，更大的经济一体化是否导致资本流动的增加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 (e) 全球化对国家和国际各级的政策和决策进程有哪些影响？

以前报告曾论述过但因篇幅未能在第三部分详加重述的全球化目前背景下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资源，特别是发展援助问题。

A. 增长——绩效与前景

10. 自 1970 年代中期以来，经济一体化增加对国家经济绩效和前景的影响，虽然不是十分明确，但平衡而言是积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殖民时代之后，一些国家采取替代进口工业化战略，并取得相当程度的成功。⁷ 然而，事实证明，以促进进出口战略作为经济政策核心的国家(日本，其次是大韩民国、新加坡、台湾、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东亚经济体)在经济绩效上胜过前类国家。而且，替代进口工业化的收益在逐步减少。1970 年代以来各组织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经济研究局和世界银行对各时期进行了大量研究。⁸ 研究表明，如果各国能够改进和维持增长绩效，更密切地融入全球经济基本上是有利的。Sachs 和 Warner⁹ 关于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积极关系的权威性研究报告显示，开放经济体的年增长率高出封闭经济体 2.4% 个百分点——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不过，开放本身不一定是较高增长绩效的必然结果。这些经济体采取了各种政策，除减少贸易壁垒和进行汇率调整外，还注意确保宏观经济稳定和利用地点优势。其他研究证实了采取匹配政策利用开放利益的重要性。Sebastian Edward 的研究是其中之一。他使用了 93 个国家的数据，采集了 9 个不同的开放指数，认为更大的开放可带来经济

增长，贸易的扩展迫使国内生产者提高竞争力，吸收和开发新技术，而所有这些都需辅助性支持政策。¹⁰

11. 质疑和批评这一证据者认为，成果并不坚实，主要因为多数研究使用的开放指数不是外部的，研究之间也不一致，计量经济学方法还常常存在缺陷。例如，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提高这类指数是国家总体经济绩效改善的结果，由同时采取的各种政策所致，与经济开放或贸易自由化政策不完全相关。实际上，关于降低国家平均关税或非关税壁垒水平等具体开放政策的研究表明，它与经济增长率没有任何系统的积极关系。¹¹ 尽管这些论点是根据案例研究证据提出的，案例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是导致增长绩效和前景改善的政策改革的中心内容，但可以认定，更密切地融入全球经济不是维持增长的充分条件，只是必要条件。Dani Rodrik (2001)¹² 在总结讨论结果时指出，一个国家无视国际贸易和长期资本流动则无法成功地发展，同样只对国际贸易和投资开放也不可能发展。最成功的发展实例是那些能够采取适当国内投资和机构建设战略，从而利用世界市场提供的机会的国家。

B. 贫困范围与分配不平等

12. 独立专家将贫困界定为剥夺甚至侵犯人权的状态。他认为，按收入性贫困和不平等表示的贫困范围指数和广义而言按穷人和人口弱势阶层达到的生活水准表示的社会发展指数，是评估全球化对执行和享受发展权影响的有效方法。换言之，评估穷人福祉的指标是他们的收入或消费水平以及各阶层之间这些指数的差距。还可根据他们获得食物、教育、保健、住处和工作的能力来评估。

13. 独立专家指出，减贫在足够长的时期经济增长最快和最持续的国家最为显著，如以前的东南亚和近期的中国和印度；在增长缓慢和不稳定的国家，如非洲一些地方，则最慢。虽然日益融入全球经济可以改进一国的经济绩效和前景(在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同时又采取相应辅助性政策的国家尤其如此)，但对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却没有产生同样的效果。如果全球化带动了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亦没有明显的恶化，全球化对减少收入性贫困范围的影响是直接的。在世界的大多数地区显然不是这种情况。它们或者增长不够(或者没有持续足够的时间)，或者收入分配恶化。于是，较高增长的收益没有转化为较小的贫困范围。根据世界银行对全球贫困范围的估计(以日均 1 美元的贫困线计算)，¹³ 穷人人数从 1987 年的 11.83 亿减少到 1999

年 11.69 亿，所占比例从 28.3% 下降到 23.2%。如果从估计中扣除中国，同期穷人人数则从 8.8 亿增加到 9.45 亿，但穷人所占比例则从 28.5 下降到 25%。¹⁴ 将这些估计按地区分列后表明，1987 年至 1999 年期间，东亚和太平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中东和北非的穷人人数减少，南亚穷人人数稍有增加，欧洲、中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穷人人数锐增。除欧洲、中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外，所有地区穷人所占比例都有所下降。在前者，主要是过渡经济体的绩效所致，在后者则归咎于政策失败、增长不稳定、内战和政治动荡等综合因素。Rober Wade 等对这种全球减贫趋势表示质疑，认为支撑全球化进程的自由政策在增长和减贫方面不一定取得良好效果。¹⁵

14. 社会发展指数，特别是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使用的社会发展指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特别是近几十年，有了全面提高。过去 25 年，世界所有地区按成人识字率衡量的教育成就都有所提高，婴儿死亡率显著下降。预期寿命有所增加，但撒哈拉以南非洲除外，那里因艾滋病毒/艾滋病肆虐预期寿命有所下降。最受影响的国家有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南非和肯尼亚。

15. 在审查全球化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关系的证据时，我们必须着眼于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分析全球化对国家间不平等的影响，第二个问题是研究各国更密切融入全球经济后国内人际间不平等的变化。总体而言，由于许多发达国家几个世纪享有“初始条件”，遥遥领先，国家间平均收入的不平等趋于增加。有人认为，这一趋势面对国际贸易制度和资金流动的偏向和不公平将更形加剧。也有人认为，由于国内的政治经济态势，不平等参数特别是收入或私人消费的不平等参数趋于稳定或缓慢变化。然而，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没有完全验证这些看法。

16. 因此，我们发现，虽然人均国民收入的不平等在过去几个世纪似乎不断扩大，但证据表明人均国民收入不平等的长期扩大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可能有所减缓。¹⁶ 增长性趋同的文献也证实了这一看法。人均国民收入的原始数据表明是趋异，而不是趋同。但是，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进行收入估计，显示或者是有条件趋同¹⁷ 或者是“双峰”趋同。¹⁸ 有条件趋同是指，如果有条件的变数不以抵消方式发生变化，人均国民收入的不平等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最终将缩小。“双峰”趋同是说，高收入国家将趋同于一个高峰，低收入国家趋同于平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另一高峰。然而，正如 Sala-I-Martin 所指出的，¹⁹ 应该小心从事，注意到除非非洲国家在不久将来开始增长，否则收入不平等将再度扩大。

17. 关于人际间收入的不平等，Cornia 的综合研究表明，²⁰ 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在 1973 年以来的全球化加速时期与以前时期相比有所恶化。例如，在经合发组织国家，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直至 1970 年代初，由于失业不断减少、收入稳定和和社会保障扩大，不平等持续下降。自 1970 年代后期以来，这一趋势开始逆转，首先在美国、联合王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然后逐步在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和意大利等。法国和芬兰等国的趋势是拉平。1989 年以后，前苏联和前苏联集团转型经济体的不平等急剧上升。在拉丁美洲，基尼系数(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参数)曾是世界上最高的，1970 年代在除南锥体之外的多数国家有所下降。但是，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由于衰退和工资份额下降，不平等再度上升。另有证据表明，在中国和印度等一些贫困国家内不平等在扩大，尽管贫富两端的收入都有所增加。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城乡差距是不平等的主要来源。在收入下降时期“向下平衡”过程中，城市收入的恶化大于农村收入。

18. 总之，Cornia 的研究表明，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全球化加速时期，所调查的 77 个国家中有 45 个国家——占世界人口的 46.2%——出现不平等扩大，有的是连续性的，有的(包括美国和中国)呈 U 字型。有 4 个国家不平等的扩大有所放慢，有 16 个国家不平等实际上有所下降。因此，全球化经济的收入增加与收入平等之间没有统一或普遍联系。它们的关系多半是由过去背景决定的，即受有关国家“初始”条件和后来政策的影响。

C. 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

19. 资源——物质和人力——的获得和技术的利用一贯被认为是驱动和维持发展进程的动力。实际上，利用适当技术常常是发展的关键性投入。它不仅可替代其他投入，也大大有助于实现在某一时间被认为无法实现的结果。它是一些发展中国家设法追赶已遥遥领先的国家的手段，也是发达世界用以取得和保持其福祉和生活水准的工具。然而，获得和转让技术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问题。大多数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在技术需求上依赖于工业化世界。只要看一下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开发支出，对这一技术鸿沟的存在就不会惊讶。为便利我们了解，现列出以下数据。中国占全球研究开发支出的 4.9%，印度占和中亚占 2.2%，拉丁美洲占 1.9%，太平洋和东南亚(不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占 0.9%，撒哈拉以南非洲仅占 0.5%。²¹ 换

句话说，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 21%的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研究开发支出中只占不足 10%。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水平低。常用的技术能力指数是在美国的专利申请数，即通过《专利合作条约》处理的国际申请。2001 年，不足 1%的美国专利授予发展中国家的申请者，而其中的 60%来自 7 个技术最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在《专利合作条约》中，发展中国家在 1999-2001 年的专利申请中占不足 2%，而其中 95%来自中国、印度、南非、巴西和墨西哥五个国家。²² 因此，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可以发展强大的本国技术能力。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意味着很难发展自己的技术或消化发达国家的技术。

20. 在全球化进程的历史上，技术转让在支撑全球经济和协助各国维持增长率上起着重要作用。技术转让或者直接通过外国投资和自己购买技术或通过传播和间接手段进行，取决于有关国家采取的政策。技术转让可以缩小工业化世界与因具有为发展目的采用、改造和发展技术的能力而受益于此种转让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然而，技术转让多半是在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的国际政策制度尚未出现时完成的。当时，各国可以灵活地采取有助于促进自身利益的政策。近期受益于此种方式的国家是目前被称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东亚经济体。以大韩民国为例，从 1960 年至 1980 年，当其经济处于改革时期，它强调仿造和逆向工程作为发展本国技术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性。虽然大韩民国于 1961 年颁布仅有限覆盖商品的专利法，但直到以后很久才因美国的行动按照新的国际标准修订这些法律。台湾也经历了类似过程，印度的药品生产业亦如此。在印度，1970 年法令²³ 削弱了药品知识产权的保护，被广泛认为推动了该部门的增长，使印度成为低价基因药物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一般而言，历史教训表明，各国可以调整知识产权制度，便利技术学习和促进自己的工业政策目标。然而，随着技术转让守则，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知识产权协定》）的问世，²⁴ 大部分灵活性消失了。发展中国家无法再遵循大韩民国或台湾和许多其他国家所走过的道路。

21. 此后的问题是评估《知识产权协定》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目前阶段获得技术。由于知识产权本身不是目的，只是可持续发展的手段，所以较相关的问题是评估《知识产权协定》规定的知识产权如何促进减贫和发展，具体而言如何有助于实现发展权。评估证据多半是间接的或者基于“代理”措施，因为不可能直接测算一国的创新能力，也无法直接测算其专利保护力度。用于剥离知识产权对经

济变数独立影响的经济计量方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非议。然而，根据知识产权委员会报告分析的证据，²⁵ 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在再分配影响方面，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²⁶ 估计，大多数发达国家(专利权持有人)因专利价值增加，将是《知识产权协定》的主要受益人，仅美国的受益估计为 190 亿美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少数发达国家将遭受净损失，大韩民国将损失 150 亿美元。在论述实施《知识产权协定》规定的知识产权后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付出的成本的同时，也有必要分析实施《知识产权协定》在增长和创新方面产生的利益。在这方面，报告认为，《知识产权协定》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大多数科学技术基础设施薄弱的低收入国家不是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报告指出，历史上的迅速增长往往与知识产权保护薄弱有关。某些事实表明，在技术先进的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虽然有助于增长和创新，这一阶段在该国成为中高收入国家之前不会到来。报告还审查了知识产权对推动贸易和投资的影响，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对发达国家出口和投资的影响。结论是，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不是促进贸易和投资流向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必要和充分激励条件。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大量贸易和投资就不会流向知识产权制度薄弱的国家。也有些证据表明，某些产业如高技术工业或知识产权敏感工业的贸易和投资流动可能受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影响，但征象远非十分明显。而且，这种情况不多，只限于技术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报告认为，对贸易和投资的任何有利影响不可能超过它的代价，至少在中期和短期。即使在技术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有力的知识产权制度吸引某些种类的贸易和投资流动可能以“仿制”和相关工业的国内产出和就业为代价。

22. 最后，在讨论这一初始问题，即《知识产权协定》是协助还是阻碍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时，基本共识是，决定技术转让成功与否的唯一最明显因素是发展中国家早日建立本国的技术能力。发展此种能力的责任主要在于该国的国内政策和举措。既然执行《知识产权协定》限制发展中国家利用薄弱的知识产权制度获得外国技术或通过逆向工程发展技术(也是提升本国技术能力的过程)，那么现行技术转让行为守则事实上可能阻碍发展中国家取得维持发展所需要的关键性技术投入。由此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何以导致发展中国家接受《知识产权协定》？我们可以认为，《知识产权协定》反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不对称，归根结底取决于后者的相对经济力量。发展中国家接受《知识产权协定》，是因为在谈判进

程该阶段提出的总体一揽子计划包括发达国家减少贸易保护(农业和纺织品)被看作是有益的,不是因为知识产权居于优先事项之首。以后的事态与某些期待背道而驰。发达国家没有履行它们的某些承诺,发展中国家生活在《知识产权协定》的负担之下。在本节结束之前需要指出,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提交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的报告(E/CN.4/Sub.2/2001/13)中审查了《知识产权协定》对人权的影响,特别是对执行健康权的影响。

D. 资金流动与金融不稳定

23. 目前更大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否导致资本跨境流动的增加,资金流动的波动是否助长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这些问题已成为全球化辩论的焦点。在一系列危机打击在许多方面被称为模范改革者的新兴市场以后,更是如此。危机 1994-1995 年始于墨西哥, 1997-1998 年降临东亚和俄罗斯联邦, 后于 2001-2002 年发生在巴西、土耳其和阿根廷, 2001 年再现于巴西。每次的近似原因都是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动发生逆转。根据现有估计,在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等最极端的例子中,2000-2001 年资本流入减少数额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6.5%或近 14%。独立专家在访问这些国家的报告(E/CN.4/2004/WG.18/3)中详细分析了阿根廷和巴西危机的原因。在多数情况下,危机对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导致产出收缩,劳动力市场紊乱,贫困范围扩大,其他社会发展指数恶化。这些后果相当于对人权的侵犯。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些危机是现有全球化进程的副产品,还是需要国家决策者、国际机构、捐助国政府以及私营行为者等国际社会成员采取适当措施可以解决的“市场失败”?

24. 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现阶段全球化支柱的通信技术,与以前的全球化黄金时代相比,显然促进了资本的流动。全球化进程尽管已延续多个世纪,但目前进程的许多特点,特别是资本流动的数量和速度,是现阶段全球化独一无二的。调节和管理这些方面的必要机构能力和政策工具尚待充分建立。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除 2001-2002 年巴西危机之外的所有危机总是影响实行钉住汇率制度的国家,钉住汇率在危机开始后大多弃守。在所有这些国家(又除巴西外),金融制度或者固然薄弱或者(如阿根廷)在危机前夕已受到严重侵蚀。显而易见,钉住汇率制度与力求维持稳定汇率(或固定汇率)的货币政策,与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动特别是常常由投机动机

驱动资本流动，不相适应。巴西管理危机的做法和其他国家此后的经验都表明，针对通货膨胀实行灵活汇率制度(与维持汇率相反)大大减少短期资本流入。它可能有助于减少一些国家不愿意看到的资本流动波动。此外，马来西亚这一时期成功限制资本流出的经验和智利限制短期资本流入的做法，都说明可在国家一级采取措施在过渡时期管理资本波动。基于巴西经验，还必须承认，即使实行灵活汇率，造成国家经济遭受内外冲击的因素终究是其经济的财政基本面，包括投资者对债务和金融部门弱点的看法。

25. 国际社会为处理东亚危机特别是大韩民国和以前的拉丁美洲危机采取了各种对策，如货币基金和美国联邦政府在拉丁美洲危机中与主要债权人密切合作提出振兴计划。这表明国际社会可以超出通常至少开始时必然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实行有考虑的国际应对危机办法。然而，无论采取何种国际对策，都必须有差别地、根据具体情况协调债权人。如果危机严重，可以采取正式办法，由全球行为者进行债权人协调；也可以是借款银行的自愿协议，如巴西那样；若是扭转资本外流的资金需求在机构内可以解决，可以是货币基金的一揽子计划。在任何情况下，主要目标都应该是尽量减少危机对人民生活和市场运行的扰乱和扭曲。

E. 全球化及其对决策的影响

26. 从防止侵犯发展权的角度，无论国际社会解决危机的对策如何，最重要的是在每一个全球化经济体中建立社会安全网制度。直接受影响的国家不一定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在没有社会安全网或社会安全网无法以足够速度和范围运行时，国际社会有责任协助各国建立此种安全感或提供特别援助。我们由此开始审查全球化对国家和国际决策的几个主要影响。

失去决策自主权

27. 由于全球化，任何国家在履行对权利诉求人的义务时，都不能孤立地采取行动。它必须顾及其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晌，还需要考虑它们对其政策的反应。这一评估甚至在政策制定之前就必须完成。因此，决策的自主权在丧失，对于常常过于弱小而难以抵挡此种反应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许多现在的工业化国家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和几个发展中国家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可以利用的一些政策选择(如

不严格的知识产权或利用税收资助优先领域的公共支出),现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不复存在。例如,可以看看遵守世贸组织行为守则对国际贸易和关税制度的影响,结果往往使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外部确定的——拉平。于是,发展中国家失去了巨大的微观政策回旋余地来影响它们的相对价格,进而影响国内资源配置。税收政策作用也变得十分有限,因为它的大量使用可能扭曲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与国际价格相比的价格,进而损害本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在此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只剩下汇率调整、利率变化和工资限制等宏观经济政策——而这些都受到世界市场动态的制约。这些国家唯一仍可较为灵活使用的工具是公共支出,但公共支出必须有足够拨款。然而,这一手段在多数情况下受到税收不足的严重影响,特别是当进口关税全面削减,继而出现的公共赤字决定着公共支出水平时。

机构能力制约

28. 各国必须了解和预见一体化进程的复杂性、各种国际贸易机制的影响,以及一国签署的协定,并在制定各自战略的进程中将它们考虑进去。这样做常常要求建设专门能力、知识基础和谈判技巧,以在有关论坛上清楚表述和成功地提出自己的关切。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这些能力,它们时常不自觉地接受各种承诺,但却无法事先预见和了解其对发展进程的影响。所以很难及时建立必要的保障,以尽量减少和克服某些必然事件的后果。显然需要提供技术援助和发展援助,建立发展中国家的此种能力,以改进全球化进程的管理。

调整的速度

29. 在早期的全球化阶段,民族国家可以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通过改变机构、行为模式和社会惯例来适应国际变化。在目前阶段,变化十分迅速,在我们适应某些冲击之前,已经被对它们冲垮了。所以,弱小的国家,由于机构能力有限,在经济、金融甚至在文化上常常受强国的主宰。对全球化的许多批评大多涉及这种不对称和不平等,以及发展中国家无力快速适应变化以收获全球化的成果。

政策协调的必要性

30. 由此，我们承认必须在各级协调、统一地制订政策和决策。部门政策需要与次国家和国家总体政策相一致，国家政策需要与国际政策制度相符合，构成国际发展环境的各国及其机构的行动也需要协调和连贯。这些关切对制定公平、透明和可信的国际政策制度，以管理全球化进程，建设国家能力，利用全球经济通过跨境生产和消费而带来的利益，具有各种影响。

三、管理全球化进程：致力于执行发展权

31. 管理市场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以期实现预期发展进程，执行和享受发展权的过程，受到一个重大固有因素的制约。存在制约，是因为全球化进程往往青睐“自然禀赋”丰富，更能支配资源，也就是“初始条件”优越的国家，不利于在这些方面处于劣势，身为发展进程“后来者”的国家。当然，也有办法克服这些初始障碍，开辟一条自己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不仅可以扭转固有的不平等，还可以产生符合执行和实现发展权的结果。这条道路的基础是承认国家在提出、制定和执行有关发展政策，对战略进行必要排序，以便利用全球经济提供的机会方面负有主要责任。尽管这一作用必须由国家来承担，但国际社会也要发挥明确的、实质性作用，即负责营造一个有利于国家实施发展政策的全球环境。同时——不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关切，国际社会还必须提供发展援助和技术合作，以帮助承诺普遍实现所有人权的国家达到这些目标。

32. 然而，没有统一的政策“配方”供所有国家谋求发展目标时遵循，在执行发展权问题上更是如此。必须根据符合国情的发展目标制订和部署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工具。然而，所采取政策的性质主要是“路径依赖型的”，²⁷即依赖于一国经济的初始条件和发展道路。此种“路径依赖”排除了任何普遍适用的最佳公共干预措施。在多数情况下，可以有一套政策达到预期结果——也就是一条“走廊”，从中选择最佳途径。而且，对影响预期绩效不同方面的政策必须加以协调，将其当作一揽子计划或改革方案一并实施，以便它们在达到预期发展结果的进程中相互支持。例如，源于国际经济的外部冲击可能对不同国家产生不同影响，各国根据各自

初始条件、机构以及发展水平和道路采取不同对策或调整方法，由此产生了不一致的结果。

A. 执行发展权的国家政策

33. 在分析全球化对实现符合发展权结果的影响时，可以看出，无论愿望或是改进经济绩效和维持未来增长前景，或是减少贫困和缩小收入及社会指数的不平等，或是成功地获得执行和维持发展进程所需要的技术，或者尽量减少资本流动大起大落的影响和对经济的扰乱，在每种情况下最成功者都是有能力利用符合国情的国内投资和机构建设战略，把握日益融入世界市场的机会的国家。对拉丁美洲和非洲等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与全球经济融合步伐的加快开始于实行自由的经济改革模式之时。独立专家在评估这一经验(E/CN.4/2004/WG.18/3)认为：

- (a) 作为发展框架的自由化模式无论在它直接谋求的目标方面，还是在它为达到这些目标而鼓励使用的手段方面，都受到限制。智利等一些国家跨越一揽子自由化模式政策，实现和维持了高和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减少了贫困范围，并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不平等，实现了取得符合发展权的结果；
- (b) 稳定和审慎的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和财政政策是以较高和较稳定的速度维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 (c) 经济增长具有促进和构成性作用，因为它吸收劳动力，并得益于因经济与全球市场更加融合而提高生产力和获得更大、更广阔的市场；
- (d) 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完全摆脱全球经济冲击的扰乱和国内政策无法预见的后果，所以必须以适足、适当的方式建立社会保障和安全网；
- (e) 精心制订和执行收入转移政策可以减少贫困，但缩小收入性不平等则需要采取战略，提高人的能力和加强提供关键性社会服务的机构能力。

B. 执行发展权的国际合作

34. 从案例研究取得的经验表明，在全球化的目前阶段，国际合作与执行实现发展权战略的一揽子国内政策同样重要。对在实现人权及有关国际人权规范和标准

方面存在巨大差距的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甚至更加重要，因为这些国家没有足够的技术和资源能力来实现各种人权。在处理突发和无法预见的危机及其影响，特别是对劳动市场的影响时，国际合作也十分关键，即使对中等收入国家也必不可少。而且，与必然按国情制订的国家执行发展权政策不同，协助执行发展权的国际框架在覆盖范围上必须是全球性的。它必须营造一个透明和非歧视性环境，促进一国各地区和人民普遍和公平地获得全球化的利益。例如，制订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协定的世贸组织的国际贸易制度，在实施上必须一致、一贯和公平。它没有这样做(特别是在农业和纺织品贸易上)，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基本不对称的部分反映。这一问题在两类国家最近各回合贸易谈判中占据重要位置。它的解决是未来在建立公平、可信的执行发展权框架方面取得进展的关键。

35. 同时，执行发展权的国际合作也可以采取其他适合具体情况的形式。它可以是在当地和外部诱发的危机中应付特殊要求；也可以是实施一项中期或长期发展战略。例如，独立专家在关于南美洲经济体的国别报告中指出，在 2002 年阿根廷危机中，国际合作的形式本可以是在后危机期间采取建立社会安全网的反周期性政策，而不是强迫政府留出更大的初级盈余。如果当时这样做，本可有助于缓解危机的影响，不致于在高峰时期穷人、失业人口和赤贫者(被列为极端贫困者)达到该国历史前所未见的水平。关于智利，独立专家认为，为努力营造一个更确定的外部贸易环境，该国寻求并取得对其中长期发展战略的国际支持，通过与伙伴国家签订一系列贸易协定，改善其出口品主要是初级产品的市场准入。最后，关于巴西，独立专家提出，国际合作的形式可以是保护资源流动，维持社会部门和社会保障支出，同时释放资源，促进增长和执行反映发展权概念的发展战略。通过赠款和优惠援助实施的一个重要国际合作种类，是按接受国需要提供官方发展援助。

C. 发展契约——在国家一级执行发展权

36. 独立专家在以前的报告中扩大了“发展契约”的概念，将其看作是执行发展权方案的机制。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发现自己基于权利的发展承诺——涉及有关发展政策，包括提供公共产品；还涉及社会部门发展政策——因无法获得维持增长所需要的资源而受到威胁或影响，它可以根据发展权框架，与国际社会达成“发展契约”，在实现发展目标上寻求发展和合作。“发展契约”的逻辑是国际社会接受并

在法律上承诺单个或集体地谋求普遍实现所有人权，发展中国家本身则须明确遵循旨在普遍实现人权的发展战略。独立专家援引“发展契约”概念，将其看作是谋求以权利为基础的发展的手段，因为这一概念基于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负有承认、促进和保护普遍实现所有人权的“相互承诺”或“相互义务”。发展契约的目的是确保发展中国家如果履行义务，它们实现发展权的计划不会因缺乏资源而受到影响

37. 执行发展权契约有三项核心内容。第一，必须有一项方案，由发展中国家通过协商制定，在国内在有关人民中间按透明和有公平参与原则协商，在国际上与其他国家和援助机构平等协商。这一方案应该指出实现发展权需要采取的政策和相应措施。第二，应该阐明其他机构包括捐助国和多边机构采取步骤实行合作的责任，包括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责任。第三，需要建立一项机制，监督方案的执行。监督机制必须可信、独立和公平，以便有关各方可以接受方案的条件。为资助发展契约，独立专家引述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负有将最多为 0.7% 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承诺，并提议设立一项“兑付基金”。当发生紧急情况，一国的发展权方案因缺乏资金可能受到影响时，可以诉诸该基金。可成立一个支持小组，为该机制服务，并在提出建议的发展中国家的相互议定计划获得批准时，要求释放资金。

38. 独立专家强调，他的发展契约建议不需要拟订新的发展文书。相反，它提供了一个有效机制，按照基于权利发展办法的原则，有效执行现行发展文书，如减少贫困战略文件或综合发展框架。他认为，所提出的发展契约概念承认责任的相互性，要求独立、可信地监督援助接受者和提供者的行动，并规定在发展进程中出现政策失败时诉诸适当的补救机制。由此引出基于权利发展办法的两个中心问题，即问责原则和诉诸补救机制，允许——不一定通过法律手段——遭受外来发展的未预见或扰乱影响的国家，或者在实现发展权方案因缺少资金或扶持性国际环境而无法执行时，请求救济。

注

¹ This report builds on, elaborates on and analyses in depth most of the points made in the earlier “preliminary study”.

² First report: E/CN.4/1999/WG.18/2; second report: A/55/306; third report: E/CN.4/2001/WG.18/2; fourth report: E/CN.4/2002/WG.18/2; fifth report: E/CN.4/2002/WG.18/6 and E/CN.4/2003/WG.18/2, at www.unhchr.org.

³ It mainly comprises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he other more recent instruments that address the situation of special groups and regions i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re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and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⁴ See the independent expert’s fifth report for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is issue.

⁵ A particular kind of economic growth may also have a constitutive role in the notion of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when seen in terms of the opportunities that it generates for the people to be productively employed and have a life of dignity and self-esteem.

⁶ See 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1999*.

⁷ As many as 42 developing countries, of which 12 were in Latin America, 6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nd 15 in sub-Saharan Africa, grew at a rate of more than 2.5 per cent per capita in the face of high population growth rates in the years up to 1973. See Dani Rodrik,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Trade as if Development Really Mattered*, Boston,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July 2001.

⁸ See, for instance, Jadish Bhagwati, *Foreign Trade Regim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Anatomy and Consequences of Exchange Control Regimes*, and Anne Krueger, *Foreign Trade Regim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iberalization Attempts and Consequence*, Cambridge, MA, Ballinger, 1978; and Michael Michaely, Dmitri Papageorgiou and Armeane Choksi (eds.), *Liberalising Foreign Trade - Lessons of Experienc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1.

⁹ Jeffrey Sachs and Andrew Warner,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ies*, 1995.

¹⁰ Edward's study also indicates that countries with higher levels of trade distortion have had lower economic growth - a result that is important for formulating policies for implementing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¹¹ Francisco Rodriguez and Dani Rodrik, *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 A Sceptic's Guide to the Evidence*,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01.

¹² See reference at note 7.

¹³ World Bank staff estimates, GEP 2003, as reported in Stanley Fischer's revised version of the Ely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eeting in Washington, DC on 3 January 2003.

¹⁴ China and India account for 38 per 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nd 60 per cent of the poor in 1990.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during the 1990s, when China grew at 9 per cent and India at 6 per cent per annum, there was a sharp decline in the global poverty rate.

¹⁵ Robert Wade, *Globalization, pover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 Does the liberal argument hold?*, LS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02-33, Development Studies Institute, 2002.

¹⁶ See, for instance, François Bourguignon and Christian Morrison, *Inequality among World Citizens 1820-1992*,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002, pp. 727-744; Xavier Sala-I-Martin, *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 Working Paper w8933, May 2002.

¹⁷ See Robert Barro,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Stud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¹⁸ Danny T. Quah, *Twin Peaks: Growth and Convergence in Models of Distribution Dynamics*, *Economic Journal*, 106, 1996, pp. 1045-1055.

¹⁹ Xavier Sala-I-Martin, *The Disturbing Rise of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w8904, April 2002.

²⁰ See G.A. Cornia, *Liber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 (WIDER), working paper No. 157, March 1999.

²¹ Source: *World Science Report 1998*, UNESCO, Geneva.

²² Figures from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tegra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Development Policy*; United Kingdom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 September 2002.

²³ The Act provided, inter alia, for only process protection for a period of seven years in food, drugs and chemicals. This allowed patented drugs to be reverse-engineered, provided a different process was used in manufacture.

²⁴ The agreement on TRIPS emerged from the Uruguay Round of trade negotiations completed in 1994 that led to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and set the rules for the WTO Agreements, including TRIPS. Under this agreement all WTO members are to provide minimum standards of protection for a wide range of IPRs. It incorporates provisions from many existing IP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such as the Paris and Berne Conventions administered by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TRIPS, however, also introduces a number of new obligations, particularly in relation to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patents, trade secrets and measures governing how IP rights should be enforced. The rules under the Agreement came into effect on 1 January 1995 though the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were given until 1 January 2000, and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until 2006, to comply with the rules.

²⁵ See note 22.

²⁶ See for details,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2002 - Making Trade Work for the World's Poor", Washington, DC, p. 133.

²⁷ The theoretical literature on this subject is large and well known. However, the best account of the importance of policies in a set-up of dynamic equilibrium may be seen in a recently published lecture on path dependency given by the noted economist, the late Professor Sukhamoy Chakravarty, at Erasmus University in April 1990. See Storm and Naastepad.

-- -- -- -- --